

郑振铎与中国传统文学研究

陆荣椿

【摘要】本文对郑振铎长达三十多年的有关中国传统文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成果，作了比较系统深入的梳理。郑振铎不仅是我国一位著名的现代作家、文艺编辑家、文学史家与文物考古学家，也是公认的中国传统文学研究的一位开拓者与探索者。他对中国传统文学很早就提出了科学的主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郑振铎对中国传统文学、俗文学（俗文化）的不倦搜集、整理和研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学 整理研究 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一、“五四”时期对整理、研究中国旧有文学的的提倡和规范

第一个专门谈整理和研究旧文学的人要算郑振铎。他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载1922年10月出版的《文学旬刊》第51期）中，强调指出：“我们要明白中国文学的真价，要把中国人的传统的旧文学观改正过来，非大大的先下一番整理的功夫，把金玉从沙石中分析出来不可。”他认为，由于前人对什么是文学的理解以及古籍分类方法比较混乱，所以在整理前首先应确定中国文学的范围，他的意见可大体分为九类：诗歌，杂剧、传奇、弹词、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笔记小说，史书（部分）、传记，文学性论文，文学批评，杂著。应当说，这个划分范围有一定的创见，也比较符合实际，可供中国文学研究者参考。其次，关于整理的方法，郑振铎强调两点：应具有“打破一切传袭的文学观念的勇气”；发扬“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指文学统一的观察，归纳的研究，文学进化的观念），最后谈到整理的步骤，作者提议开始阶段最好先作局部的研究，例如，一部作品的研究，一个作家的研究，一个时代的研究，一个派别的研究，一种体裁的研究。当然，这种局部的研究，有时也不可避免地牵涉到整体而不能不谈。

1923年1月，《小说月报》第14卷1期出刊。从沈雁冰手里接任该刊主编的郑振铎，在该刊物上发表论文《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文章一开头就明确指出，“我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理由有二：第一，不将诸如“文以载道”、“美刺”附会之类的旧文艺观念揭露和打翻，新文学无从顺利建设。第二，“我以为我们所谓新文学运动，并不是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国固有的文艺作品。这种运动的真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中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在这里，郑振铎比前一文更进一步，将重新整理国故（旧文学）的必要，以及它与新文学建设的关系，说得颇为清楚。此文末了，还坦言研究者应具严肃求实的研究态度，“我们须有切实的研究，无谓的空疏的言论，可以不说；”“我们应采用已公认的文学原理与关于文学批评的有力言论，来研究中国文学的源流与发展”。郑振铎的文章，只是该期《小说月报》上“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专题讨论中多篇文章的一篇，其他如沈雁冰、顾颉刚、王伯祥、余祥森等都著文参加讨论，一时颇为引人注目。郑振铎所以如此重视中国旧文学的整理和研究，并把它公开提出来讨论，除了因他本人对传统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有着比较清醒、正确的认识以外，还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有相当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旧礼教、旧传统、旧文化、旧文学，好不容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得到初步的清算和扫荡，现在再来提出对旧文学（也是一种“国故”）的整理和研究，显然是有意倒退，是针对新文化的一种反动。对于这种极端的态度，郑振铎及其战友沈雁冰等是很不赞成的。他们坚持，提倡新文学运动，同以科学态度整理、研究中国旧文学，二者并不矛盾，相反，还互有裨益，绝不能虚无主义地否定、抹杀中国旧有的一切文艺作品。足见，郑振铎强调正确对待中国旧有文学，深入地整理，辩证地继承，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以后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二、开路与探索：前期整理及研究的成果

郑振铎深深懂得，中国文学发展历史悠久，作品仍为庞杂，整理研究任务异常繁重，不能企图于短时期内改变整个局面，产生可观效果，因而主张一部分有志人士先来从事“中国文学的片段研究或整理”，也即作“局部的”（一部分作品、一个作家、一个时代、一个派别、一种体裁）研究，既属开路，又是探索、藉以累积经验，扩大成果。他自己也率先这样去做。

针对《诗经》这一部中国古代诗歌总集几千年来影响巨大、却被严重曲解的现象，郑振铎在深入阅读有关资料的基础上，首先“发难”式地写成论文《读毛诗序》（载《小说月报》第14卷1号，1923年1月），以便通过对《毛诗序》注疏这一沉重压盖在《诗经》上面误导后人的一堆“瓦砾”的批判，揭示《诗经》真相及走上研究的正路，文章指出，“《毛诗序》最大的坏处，就在于他的附会诗意，穿凿不通。《毛诗》凡三百十一篇，篇各有序……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附会的，是与诗意相违背的”。比如，《毛诗序》所坚持的“美刺”说，既在作品中找不到什么根据，运用时也无一定的标准，甚至自相矛盾。文章举出祭祀诗《小雅·楚茨》、《大雅·鳧鷖》二首，恋情诗《周南·关雎》、《陈风·月出》、《陈风·泽陂》三首，以及《召南·草虫》等八首叙述男女关系的诗为例，说明《毛诗序》以“美刺”之说来随意乱套，纯属穿凿附会，十分荒谬，令人“不可思议”。

为了驳倒“所谓《诗经》由来已久，其说必有根据”的辩解之词，文章还对《毛诗序》的作者是谁进行了分析，认为后汉卫宏所作的可能性最大。而汉人传经，或抱残守缺，死守师说；或多方假托，随便引证，所以其说颇不可靠。

继郑振铎之后，一些中国文学研究者也来发表对《诗经》的见解，如顾颉刚的长篇论文《诗经的厄运与幸运》，就在《小说月报》上连续刊载。

为了鼓励更多一些人来研究《诗经》，郑振铎将自己花费很大精力搜集到的历代有关《诗经》注疏、解释、训诂、音韵、名物、校勘的二百一十种古籍刊本，详细开列书目，以《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的方式予以发表。在当时公立图书馆甚少，一般学人普遍感到研究资料寻觅不易的情况下，郑振铎此举，实属难得。

不仅如此，同样出于推动中国文学的整理与研究，为研究者提供方便的目的，郑振铎又在查阅古籍、推算、摘录的基础上，陆续写出《中国文学家生卒考》，着重介绍了从汉代到清代320位著名文学家的生卒年及传略，在《小说月报》第十五卷开始，连续刊登7期。同时，还撰写发表了《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的资料性长文，共介绍了中国历代著名作品（从《诗经》、《楚辞》到《水浒传》、《红楼梦》）以及有关文学史、文学评论书籍共247种，这对于准备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人是很有用处的。

长达数千年、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国外出版的一些世界文学史著述，竟都没有中国文学的内容；同时，国内读者也看不到这类叙述世界文学的书籍。因此，郑振铎决心参考国外有关著述，编辑一部《文学大纲》，将包含中国文学演变发展内容的世界文学史知识介绍给国内读者。经过郑振铎的悉心编撰，《文学大纲》于《小说月报》第十五卷1期起开始分章连载，历时三年之久（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全书42章中，有12章（约20万字）是专门叙述从《诗经》、《楚辞》到19世纪我国著名作家作品的中国文学发展轨迹的。其中叙述元代以来中国戏曲、小说的一些章节，都是对中国文学史内涵传统观点的某种突破。而有关材料都是郑振铎亲自设法搜集的，观点也力求可观公允。有人因此谈到，如将《文学大纲》中有关论述中国文学的部分独立出来，就是一部自成体系的中国文学史。

由于郑振铎大力提倡整理、研究中国传统文学，响应者日益增多。1927年6月《小说月报》出版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可说是一段时期以来国内学者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这本由郑振铎主编的“号外”，共刊登国内中国文学研究学者撰写的六十多篇文章，论述精辟，各具功力。郑振铎一人写了《卷头语》、《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武松与其妻贾氏》、《中山狼故事之变异》、《鲁智深的家庭》、《宋人词话》、《明代之短篇平话

小说》、《中国戏曲的选本》、《日本最近发见之中国小说》、《佛曲叙录》、《西谛所藏弹词目录》、《中国文学年表》等几十篇文章。其中《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一文指出，中国文学研究犹如一片“未经垦殖的大荒原”，值得人们去辛勤耕耘，迎来丰硕的收获。文章提出三条“研究的新途径”和“进化的观念”。前者包括研究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研究新发现的作品和史料，整理混杂不清的中国文学书目，力求科学分类。据此，郑振铎对中国文学拟出了一个共有9大类若干小类“大纲”，并列出一大批比较重要的作品或文集书目，颇具参考价值。

在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学的过程中，郑振铎的精力花在小说和戏曲方面较多。除了发表过多篇论述性文章，也以集中编辑出版作品专集的方式，来吸引人们的关注，打开局面。例如，他从1925年起，发起编辑出版《中国短篇小说集》（共三集），从历代古籍刻本中，选录了具有一定文艺价值的相当一批短篇小说（包括文言的“传奇系”小说和白话的“平话系”小说）刊行以飨读者。在“总序”“例言”以及各集“序言”中，郑振铎比较深入地论述了中国短篇小说的定义，及其形成和各个时代发展的特点。

1927年5月，郑振铎因避免国内政治迫害，前往法国、英国访问和暂住，有机会接触到流失在英、法国家图书馆中的中国古籍。他在所写的《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的长文中，除了提到本世纪初被帝国主义分子伯希和劫走的大批敦煌手卷和钞本目录之外，还列举了他所读到的几十种国内罕见的古本小说和戏曲，诸如《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演义》、《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李卓吾先生原评西游记》、《钟伯敬先生批评封神演义》、《韩朋十义记》、《西江祝嘏》等，郑振铎都比较细致地指出它们的珍奇难得之处。

三、《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出版

早在1922年9月，郑振铎曾经发表一篇短文：《我的一个要求》（见《文学旬刊》第49期），文中对现有几部缺憾甚多的中国文学史著述明确表示不满，强烈要求“有一本比较完备些的文学史”著作问世。接着，他又写了《评Giles的中国文学史》（载《文学旬刊》第50期）一文，对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汉学家翟理斯于本世纪初出版的，所谓世界最早的中国文学史直率地提出批评，指出其最大的错谬有四点：疏漏、滥收、详略不均、编次不当。总之，“百孔千疮，可读处极少”。文末表示希望，“我们中国人能够做出一本英文的《中国文学史》矫正他的错失”。读了这两篇短文，人们对于郑振铎下决心并发奋撰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厚望，就能完全理解了。

当然，编著一部篇幅浩大、比较完备的中国文学史决非一件易事。它需要作者熟悉和了解各个时代的文学现象、文学发展潮流，熟悉和了解著名作家、作品的成就和风格特色，为此必须积累、掌握充分的材料；它也需要作者具有正确的历史观、文学观、各方面的丰富知识，以及较高的分析归纳能力。郑振铎深知这一项工程的艰巨性，所以用了几年时间作准备：积极搜集材料，特别是近些年新发现的有价值的作品集和材料；阅读、比较和思考，敢于怀疑和发现问题；及时发表哪怕是片断性的研究心得（长篇文章或短文）。而郑振铎于20年代末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上），则不妨认为是他准备撰写多卷本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先期尝试。这本于1930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著作共十六七万字，分为5章，主要论述了五代、北宋和南宋时期以词这一文学样式为主导的发展变化情况。其中对于词的起源和发展，主要作家作品的分析考证，以及敦煌“变文”和俗文学发现的意义，都提出自己的看法。

1931年初秋，郑振铎利用到北平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执教的机会，开始实行他盼望已久的多卷本《中国文学史》撰写计划。经过一年左右日以继夜地紧张写作，一部规模颇大、观点新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终于完稿并在北平出版了。该书共分60章（建国后再版时作者又增添最后4章），近70万字，叙述的时代和内容，从西晋以前的古代文学代表性作品《诗经》、《楚辞》起，到明代嘉靖年间开始的近代文学时期所产生的重要作品（戏剧、小说）和作家为止（近代文学下限本应截止于“五四”运动前夕，由于客观原因，该书当时只写

到明代末年)，基本上没有遗漏。尤其难得的是，全书根据不同章节文字叙述的需要，配以精选的珍贵插图共一百七十多幅，从而有力地加深了读者对全书内容的真切感受。

与先前的一些文字史著作相比较，《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有如下一些特点

1. 比较注意突出时代、社会环境对一种文学样式、流派兴衰变化的影响，以及对主要作家思想感情和作品内容的影响。因而，分析问题时，能够从时代发展要求的角度和特定的社会环境出发，得出应有的结论。例如，该书第八章论述“五言诗的产生”时，以比较充分的史实和材料，否定了前人所谓五言诗产生于汉初景、武之世的论断，而肯定它“发生于成帝时代的前后”。

2. 打破一些文学史著作论述范围十分狭窄——主要谈散文（古文）和诗，忽视小说（话本、讲史、演义）、戏曲（戏文、杂剧）、讲唱文学（变文、诸宫调、宝卷、弹词）以及散曲、民歌等大众文学的倾向，此书尽量增加了上述方面的内容，篇幅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不仅材料是最新的，论述也较有说服力。

3. 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中国文学受到外来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印度佛教文学的影响，从而衍生出好几种新的文体和样式。这在第十五章《佛教文学的输入》、第三十三章（变文的出现）等章节中都可以见到的。

4. 在文学史的时代分期上不袭旧说，而是“就文学史上的自然的进展的趋势，分为古代、中世及近代的三期，中世文学开始于东晋，即佛教文学的开始大量输入的时期；近代文学开始于明代嘉靖时期，即开始了昆剧的产生及长篇小说的发展之时”。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后，社会反应不错。鲁迅就曾向友人曹靖华推荐过。

继《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之后，郑振铎于1938年又出版了一部四十余万字的专著《中国俗文学史》，从而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俗文学即民间文学，历代流传于下层民众中的小说、戏曲、变文、弹词、民歌等都包括在内。中国俗文学历史的源远流长和创作的丰富多样，使得它们虽然不能登上“正统文学”的“大雅之堂”，却无法被排除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之外。事实上，撇开俗文学不谈，任何文学史著作都将是残缺不全的。郑振铎正是着眼于俗文学生动真实地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他们表现着另一个社会，另一种人生，另一方面的中国”），以及它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而坚持不懈写出这本书的。

《中国俗文学史》所叙述的范围，是除小说、戏曲以外的其他俗文学样式（大约作者考虑：小说、戏曲作品繁多，须另撰专书，故不列入），包括民歌、变文、杂剧词、鼓子词、诸宫调、散曲、宝卷、弹词等。全书共分14章，按时代分别叙述论证了上述文体的兴起、流传与演变情况，并附有大量的作品举例，都是郑振铎从各方面的细心搜集剔选的，比较难得。尤其是第六章（变文），第八章（鼓子词与诸宫调），第九章《元代的散曲》，都有较为深入的论述。而在第一章《何谓“俗文学”》中，作者所专门提出的“俗文学”六个特质：大众的；无名的集体的创作；口传的；新鲜的，但是粗鄙的；想像力与保守性并存；勇于引进新的东西。还是概括得较为确切的。

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的出版时间相隔不长，郑振铎还将历年所写的研究中国文学的论文先后结集出版，它们是《中国文学论集》、《佝偻集》、《短剑集》、《困学集》。其中不乏观点鲜明、分析入理、内容扎实之作。建国后，上述几个集子的论文都被收入郑振铎的三卷本《中国文学研究》（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之中。

四、抗战时期的研究整理工作与建国后的新收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很快沦陷，帝国主义控制的“租界”也成为“孤岛”。但郑振铎并未向内地撤退，而是以特殊的方式为民族抗战出力。这就是留在上海帮助国家秘密抢救和保存民族文献。他先是以个人的力量进行，后又在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支持下，联合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张元济、张咏霓、何炳松等人，

秘密地组织了“文献保存同志会”，从1940年初到1941年末，替国家秘密收购到国内私人藏书家因战火蔓延而被迫散出的大批珍贵古籍文献，包括“国家级”的珍本善本图书共三万余册，及时安全转移和保管起来。其中最值得一说的，是他及时发现和“抢救”到一批散佚已久的戏曲古本《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共有64册，内收242种元明两代杂剧，大多为世所罕见者。为了让研究者和读者见到这批戏曲古本的真面目，郑振铎特地从中选出一百四十余种，编成《孤本元明杂剧》，交给商务印书馆排印线装本32册出版。郑振铎抽暇写成了长达4万言的《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比较详尽地谈到这批戏曲古本重新发现和“抢救”的经过，其在辗转收藏中的缺失状况，这批古本的内容和价值所在，以及版本源流和收藏者的校订考证等，是中国戏曲研究者所不能不读的。

抗战后期，郑振铎蛰居沪上避敌，无法潜心研究，但还是在整理、保存古籍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将勉力搜集到的八百多种清人文集编成《清代文集目录》一本拟印行。为此写了《序》和《跋》，叙说搜集诸书之不易及自己之心情。又如，拟将珍藏的明清传奇刻本多种，陆续印行，以供流传。但实际上，自《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收明清传奇6种）于1944年印出后，其余便因故中止了，诚为可惜。郑振铎曾写有《〈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序》，谈及印收缘由。

郑振铎在建国后担任了文化部门繁重的行政领导职务，并有相当一部分精力用于中国绘画、版画等艺术传统的研究，以及筹划这方面图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但由于他也是新中国第一任文学研究所所长，故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仍很重视，并取得新的收获。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以新的立场观点探讨和阐述中国文学的传统。如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歌传统》、《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小说传统》、《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戏曲传统》等文章中，谈论其演变过程并以作家作品举例时，都强调提到了文学离不开人民这一深厚土壤的传统：“中国诗的传统是民间歌谣的传统。中国各种形式风格的诗，都首先产生于民间，为老百姓所喜好，而后才为文人所掌握。”中国小说“一开头就不是由几个有才能的文人创作出来的，而是民间来的，是口头流传的，它最早是群众文娱活动的一种”。“任何一种戏曲如果不是从民间来的，或不是生根于人民的土地中就一定会失传”。

第二，参加古典文学名著的标点和整理工作，为其重新印行撰写有独到见解的“序”和“跋”。如《影宋本楚辞集注跋》一文，以广博的学识谈及历代注释《楚辞》的情况，而为纪念屈原逝世2230年而影印的朱熹本《楚辞集注》，则明确肯定是“今日我们所见《楚辞》的最古和最完整的一个刻本”。又如，他参加《水浒全传》的标点整理工作后，写了《水浒全传序》一文，详细地谈到《水浒传》各种刻本的增删所产生的利弊，并专门指出金圣叹的“腰斩”《水浒传》，起因于仇视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的节节胜利，所以“是从他的反动的政治思想出发的”。《刘知远诸宫调跋》则记叙了这一距今七百多年的民间古本从国外回归祖国的历程和意义，并从刘知远、李三娘的团圆论证了中国民间故事所以多有团圆结局的原故。而郑振铎为影印的《古本戏曲丛刊》所先后撰写的四篇《序》文，既含有对保存古剧颇有必要，可供戏曲事业“推陈出新”及“提高”之助的认识，也没有忘记及时指出，历代戏曲家、艺人、出版家、藏书家为了创作、演出、保全这些多数题材为群众喜爱的戏曲本子曾经付出的艰辛努力。

第三，借对我国伟大作家屈原、关汉卿的纪念活动之机，撰写了《屈原传》、《纪念伟大的诗人——屈原》、《屈作作品在中国文学上的影响》、《关汉卿戏曲集代序》、《关汉卿传略》、《论关汉卿的杂剧》等一系列文章，全面论述了他们的创作成就和影响。

第四，撰写了《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一文。从什么观点出发来研究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如何妥善地解决我国文学史的分期？这是我国文学研究者所共同关心的。文章认为，既不能不顾历史条件生硬搬用欧洲各国文学发展的规律，又不能用资产阶级观点来研究中国文学的发展，或使文学的发展和历史的发展完全分离。

这看法无疑是对的。

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郑振铎是一个辛勤的耕耘者，以好学谦虚见长，曾经作出很大贡献。如果天假其年，郑振铎本来是在可以在改写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及其他研究方面，进一步实践他的学术观点，并取得更多成就的。

（原载于《上海文化》2005年第3期）